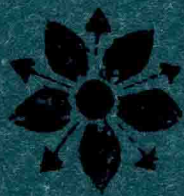


【现代贵州学术精品丛书】

二母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

张汝舟 著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贵州大学出版社

【现代贵州学术精品丛书】

二 母 室 古 代 天 文 历 法 论 从

张汝舟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 / 张汝舟著. --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6.5
(现代贵州学术精品丛书)
ISBN 978-7-81126-705-1

I. ①二… II. ①张… III. ①古历法 - 中国 - 文集
IV. ①P194.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6593号

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

著 者: 张汝舟
责任编辑: 史达宁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20.25
字 数: 45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705-1
定 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851-85981027

序 一

顾 久

贵州大学出版社成立时间虽短，但已出版了《现代世界佛学文库》《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姜澄清文集》等有影响的大著作，足见其宏大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学人情怀。现又推出《现代贵州学术精品丛书》，其中“学术”“贵州学术”等词语着实激动着我。

关于“学术”。记得山东大学研究生的第一堂课，导师殷孟伦先生一上来就恭恭敬敬、工工整整地在黑板上大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回头解释：当初他从黄侃先生学，首课季刚先生就用工楷在宣纸上为他写下这“横渠四句教”。看着他凛然的表情，我顿时对“学术”二字有了一种崇敬感，但当时还不甚明白。

后来读费孝通先生等著的《皇权与绅权》，说知识分为两类：自然的知识和规范的知识，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掌握着后者。两者的区别何在？我以为，如点火，没有文化的老太太也可点而燃之，可算“自然的知识”。但如果点燃奥运会之火炬，则需一定的人、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场合、一定的方式来引燃，否则不神

圣、不合理，社会不认可。这就是“规范的知识”。在人类原初的社会里，沟通神人、解说万物、规范秩序、安顿灵魂，乃是早期知识分子即巫史们的天职。这一点，我们仍可从今日彝族的“布摩”身上清楚看到，并映射在横渠先生的四句教中。

直至民国时期，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仍有这份自觉和担当。据说当时的清华大学教授纷纷使用外国原版教材并用外语授课，这当然有积极意义，但英文极好的吴文藻先生却坚持用汉语上课，并明确宣言：我们要建立的，是用以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国的社会学。吴先生的弟子费孝通后来赴英国从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学人类学，完成《江村经济》。马林诺夫斯基评价此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并称：“吴教授和他所培育的年轻学者首先认识到，为了解他们的伟大祖国的文明并使其他的人理解它，他们需要去阅读中国人的生活这本公开的书本，并理解中国人在现实中是怎样思考的。”“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

我是亲近过费孝通先生的。一次，主持完民盟会议后，他操着吴江普通话说：会议已经结束了，但还想给愿意听的同志们说几句心里话，不愿意的可以离席。面对这位老人，大家都选择留了下来。依稀记得费先生所言：他已经年近九旬，口袋里的“零钱”（时光）不多了。在剩下的时光里，他要好好整理一下自己当年的文章，不致谬种流传；另一方面，他要回忆自己的师友们，因为原以为是自己发明的东西，仔细回顾，却是老师和朋友们的思想，通过回顾，还自己一个自觉。自己年龄已经很大了，他寄

希望于后来人。我看着费先生含笑的面容，听着看似平淡的话语，感到一个老学者心底的期待、激情和波澜，于是关注他更多的著作。他曾讲道：我们身处于一个大时代，几千年没有过，但我们却仍然看不透、跟不上，因而也对不起这个时代。他说年轻学人读书要能读到骨子里面去，还要读生活这本大书。他说有的学者接触面窄，像个图钉，一下子可以钉得很深，成为专家；也有的在爬，爬出一条线、一个面，也是专家；但他希望青年学人最好长上翅膀，飞起来，高高地从一个面、两个面、三个面……来看清我们的时代和祖国。他说，当今的世界是已经进入战国时代的地球村，盼望中国能培养出 21 世纪的孔夫子来。中国人一定要实现“文化自觉”——看清自己，认识世界，把握未来，自主前行，最好，还能引领世界之和睦：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我从张载的“四句教”中读懂了费孝通，又从费孝通读懂了“四句教”，从而体会到“学术”二字的分量。

关于“贵州学术”。记得若干年前在外出差，突然接到朱厚泽先生的短信，大意是：建议文史馆组织诸先生读读近期《新华文摘》上的两篇文章，其一是乐黛云先生的《时空巨变与文化转型》，其二是李喜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研究》。后来得知，这是朱先生做完癌症手术，在病床上对贵州学者发出的嘱托。我仔细揣摩朱先生的意思：前一篇文章是贵州籍学者所作，影响很大；后者虽非贵州人，但文中提到改革开放前中国近代史以阶级斗争为研究主线，其后因经济建设而改变了中心，此时贵州学者李双璧倡言：近代史应该是系统复合的研究体系，而非简单的线性研究，引起全国的赞同。我体会，朱厚泽先生是在

他的有生之时，疾呼贵州学者们在学术上的自尊和自信。也像费孝通先生所期待的，看清自己，认识全国和世界；把握未来，自主前行；乃至引领学术风气。马克思曾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贵州人应该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

本精品丛书所选的作者柳诒徵、谢六逸、张汝舟、李独清等先生，均是学养精深、德识兼具的前辈，真正的“第一小提琴”演奏专家，足以为贵州学术的自尊自信做出表率。我希望，在前辈的引领下，贵州的后来者中有更多心胸博大、学识扎实、沉静有力，真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者出现。

是为序。

（作者为贵州省文联主席、贵州省文史馆馆长）

序 二

王气中

二母老人张汝舟先生自青少年时代就好学深思，勤于写作。经过六十多年的不断努力，写成的稿子差不多有三百万字。他的学问广博，涉及中国古代文、史、哲各个领域。只要是当时学术界通常研讨的课题，他都精思详析，深入有据地写成文章。他的早期作品，诗古文辞外，大多属于声韵、训诂和有关的考据诸方面，而尤以声韵见长。抗日战争期间，适应教学的需要，他才开始写语法方面的文章。他由中国固有的章句训诂入手，整理归纳出一套文言语法体系，对我国语法学作了新的探索。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他最初只是为着通晓古书，新中国成立后才发为文章。他晚年曾经对自己的学术作了自我评价，说道：“词不如文，文不如诗，辞章不如考据。考据之中，小学较优；小学之中，声韵较胜；天文历法，技而已矣，何足道哉！”这段话说得既很谦虚，也颇自信。这要从他的治学态度来理解。他的学问，主要从愤悱自强，刻苦努力中得来。虽有师承，但不墨守师法；虽尊重权威学者，但不盲目崇拜权威。因此，他对于自己所学，总不免于自信甚深，而又常怀慊然不足之感。他对于自己古代天文历法的评价，与其说是自贬，毋宁说是自况，是借儒家重道轻艺的思想来自我解嘲。实在说来，

古代天文历法是他学术中最具有特色的部分。

他的古代天文历法方面的特色，在于他能够排斥纷纭不已不能有所折衷的各家学说，独辟蹊径，自树一帜，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研究中建成自己的体系。

他深入研究《史记·历书》里面的《历术甲子篇》和《汉书·律历志》里面的《次度》，发现它们是保存古代历法最完整的文献。并对《历术甲子篇》作了推本探源的考订，写成《〈历术甲子篇〉浅释》，使这部古代历法文献拨开云雾，重放光明。

他由此推断，到了战国初期，周考王十四年（公元前427年），始有干支纪年，才进入有历法的时代，在此以前，纯属观象授时。他认为西周至春秋前期，基本上用以建丑为正的殷历。《大戴礼》中的《“夏”小正》，实际上是以“殷历”为主的观象授时的文献记录，“夏”字是后人妄加的，为此，他写了《“夏”小正校释》《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和《谈〈豳风·七月〉》三篇文章，以证实其说。其中《谈〈豳风·七月〉》一文还澄清了千百年来关于该诗用历的争议。

他对刘歆的“三统历”，战国相传的“三正论”，“岁星纪年”和二十八宿分“四象”的说法，都据理批判，指出它们在古代天文历法研究中的有害影响。并认为古代积年术和占卜法，是历来历法研究中的雾瘴，要加以扫除。

他认为王国维的“月相四分说”乃是想当然的误解。他根据现代天文科学给“生魄（霸）”“死魄（霸）”作了明确的解释，说“生魄，月球受光面也；死魄，月球背光面也”。并由此对朔、望、弦、晦、既死魄（霸）、哉生魄（霸）、既旁生魄等都作了确切的解释。同时批判了根据王氏“月相四分”说而建立的当代古历著作中的种种错误。

他批判日本天文学史学者新城新藏对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66年

的错误论断，指出我国现代一些书刊仍然沿袭新城之说的错误，为此他写了《西周考年》，以申其说，并论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把我国信史年代提前四十年，

综观《二母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可以说，《〈历术甲子篇〉浅释》是他历法观点的入门书，《西周考年》是他对历法研究的最高成就。《论丛》的文章，深入浅出，不厌其详，读者不难含英咀华，从中认识张先生对于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论点、论据和论证的方法。

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在西方天文科学未输入以前，从先秦到唐宋，一向有它自己发展的系统，我国古籍中涉及这方面学说的，也是在我国固有的天文历法系统影响下发展的。张先生从理解古书的角度入手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历法，凡所称引，都是言而有据。运用他的学说来读先秦典籍，因此也比较地使人感到亲切易懂。但由于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他就受到冤假错案的压抑，言以人废，文章得不到发表流传的机会，不能参加百家争鸣的行列。他的学说体系，社会上知道的人很少。他深以所学不能自明，不能对祖国学术有所贡献为苦。早在六十年代初，他寄我《临江仙》说：“有身难许国，空下董生帷。”正是苦闷心情的写照。

随后，他把《西周考年》和《“夏”小正校释》两稿寄给我，要我给它们写序。我对于天文历法并没有深入研究过，他是知道的，所以要我写序，当有他的微意。司马迁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显然，他是把希望寄托于我，为他空谷传响，但不久，就来了十年浩劫，我只好把两篇稿子复写了两份，分送其他友人，以备万一。

灾难的十年，终于过去。我们伟大的祖国终于拨乱反正。所有冤假错案，大都得到昭雪。先生受邀到安徽师范大学滁州分校，琅琊山下，弦诵复起。1980年，我为研究生读古书须通古代天文历法，

和南京师范学院徐复先生、山东大学殷孟伦先生联合发起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讲习会，邀请张先生主讲，他的贵州弟子张闻玉、张耿光两同志正在滁州从他进修，担任辅导。他为此写了好几篇论文。前述的《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历术甲子篇〉浅释》和《谈〈豳风·七月〉》以及其他关于月相问题和西周纪年的论争问题等文章，把他的古代天文历法体系全部勾画出来。当时他已八十二岁高龄，身体虚弱，行动极度困难，但精神极为振奋，把全力贯注在这几天讲习中，表现出一位学者对于学术的忠诚态度和责任感，大大鼓舞了所有参加的人，使讲习会取得圆满的成果。

1981年寒假中，贵州省教育当局决定邀张先生重返贵阳讲学。他不以垂老为意，欣然规往，迫不及待地要马上飞去。他的贵州又一弟子程在福同志正在滁师进修，负责照料他的行程，特来找我商谈。那知话未落音，张先生即溘然遐逝。为了把学术贡献给祖国，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他可以说是到死方休。

张先生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是一贯的。他在五六年寄诗云：“急雨风回忽放晴，软泥更觉草鞋轻。行人包裹忙收拾，要趁斜阳赶一程。”当时冤狱平反，刚刚回到教学岗位，他就急切地要把耽误的光阴赶紧补偿起来。正是这种“要趁斜阳赶一程”的精神，使他猛进不已，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现在，贵州大学张汝舟教授遗著整理小组已把张先生的著作整理就绪，即将陆续出版。张先生的《二母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不久就要和读者见面。为了便于理解张先生的学术和文章，所以略述他的写作过程和治学精神。

前人往矣，来者可追。愿张先生此编在学术的长流中，奔腾澎湃，激浊扬清，显示其无限生命力量！

一九八三年四月序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目 录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	1
《历术甲子篇》浅释·····	25
《殷历》朔闰谱·····	80
《〈殷历〉朔闰谱》的使用·····	92
《殷历》“甲子部”朔闰之推演法·····	106
《“夏”小正》校释·····	110
西周考年·····	165
评荣孟源同志的《试谈西周纪年》·····	198
谈《豳风·七月》的用历·····	208
再谈屈原的生卒·····	215
西周经朔谱·····	240
春秋经朔谱·····	442
整理后记·····	565
附 录·····	567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

壹 引言

这篇《表解》为什么写的？约有三义。

甲、前辈先生历来都说，不通声韵训诂、古天文历法，不能读古书。中国文献之丰富，豪视全球。我们祖先对文化各方面付出的大量心血嘉惠后人者浩如烟海。有清一代，声韵训诂之学，超越汉、唐，两部《经解》，成绩昭著，不容抹杀。可是也因为缺乏“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能力，有些问题竟以讹传讹，久不得正。即以古代天文历法为例，它的精粹方面往往被一些糟粕所混杂，形成了糊涂经糊涂念，从而影响了正确理解古籍，如“夏”小正，《诗经·十月之交》《四月》《七月》，以及《书经·召诰》都是由于后世读者历法不精，误说纷纭，甚至经学权威郑玄竟然改经改传，具见《诗》笺、《书》疏。又“三正论”春秋后期才出现，西周承用殷正建丑，一直到春秋前期。宋人已提出春秋初期建丑为正，日本新城新藏也对“三正论”有所怀疑，说春秋初期似乎是冬至后一月为正，但论据不足，未得学人承认。今列《表三》，历历分明。再如二十八宿每日西移一度强，每月西移

三十度强，过去大都知道，可是对于每月西移三十度强而有“中、流、伏、内（入、纳）”的过程，人们并不清楚，于是“七月流火”不得定说，详见《叁表解》。又古人以地支配四方，据北斗柄所指，可以；然而以二十八宿配地理，所谓“地望”，就附会了。二十八宿是在顺着黄道西流，统在黄道上，怎么配越南燕北？但说古书“星分翼、轸”，只能说南昌是古楚国，地望是南方朱鸟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之二，糊糊过关。可见以二十八宿配四方，害人不浅。《表一》是传统的，《表二》是我新订的。谁是谁非，摊在纸上，也详见《叁表解》。这是我写这篇《表解》的第一个意义。

乙、李约瑟教授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精通汉文，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用力三十年，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被公认是当今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权威。他认为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期间由中国辗转传到欧洲的重要技术发明，可以确知的已有二十四种以上。其中有在中国已发明使用千年或五百年或至少百年才传到欧洲的。他又估计中国今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不会照搬外国的办法，而是结合自己的一贯特色，开出一条新路来。另有一位美籍华人著一部《世界科技史》，也是大力赞扬祖国先人在科技方面的伟大贡献。然而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籍华人，他们毕竟是写历史，如果对中国古代科技没有具体研究成果，他们也就无所取材了。古代天文历法问题就是一例。这篇《表解》就想说明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把它搞清楚，诚辱没了先人的劳绩。这是我写这篇《表解》的第二个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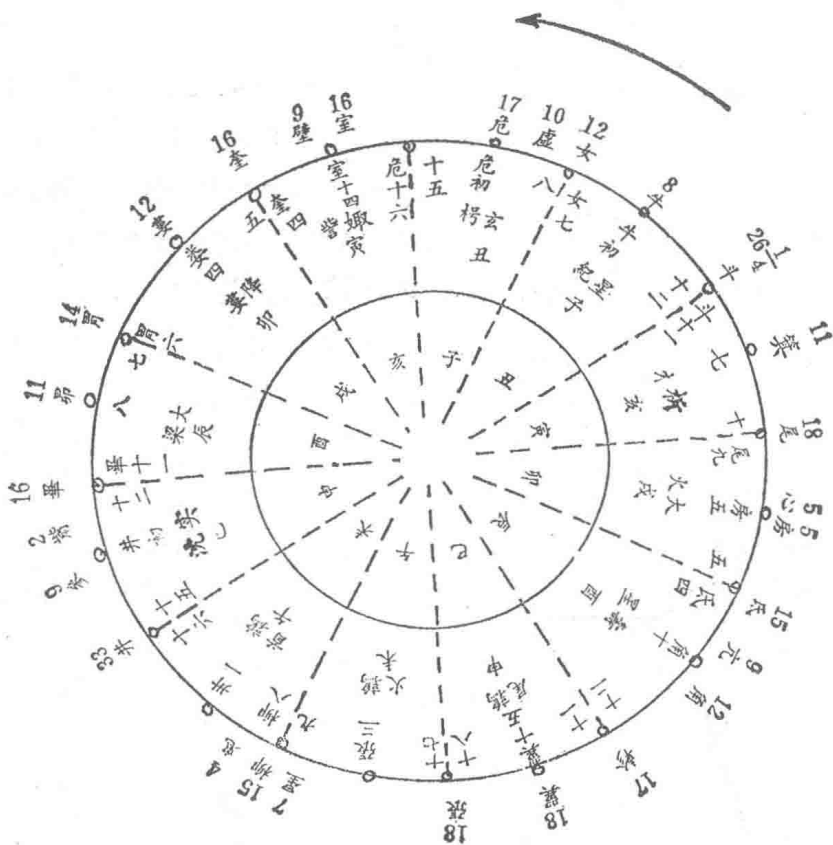
丙、我们党一再号召“恢复并发扬我党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贯彻“二百”方针。学术问

题要大家讨论，不要被若干权威所垄断。对于权威，不能迷信。真正的权威应该尊重，而有些权威提出不正确的言论，就应该批评，当然也不否定他们正确方面的贡献。刘歆父子在学术上贡献不少，特别是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为后代公私目录著作树立了典范。刘歆反对十六博士的专横，提倡政府官学除今文博士外，应立古文博士，是有功的，正因为如此，他因袭六历，造《三统历》及《世经》来论定西周年代，影响甚大。班固妄誉刘歆“推法密要”，于是《三统历》及其所定西周纪元为公元前 1122 年成了权威论断。齐、梁时代两大历法家何承天、祖冲之已经指出：四分“久则后天，经三百年辄差一日”。以现在密律验之，诚然。可是刘歆权威倒不下来，一直迷惑逾二千年。王国维先生就上他的当，“悟”出“月相四分法”，新城新藏又迷信王先生，造成错误。王国维在蒙古史、戏曲史、甲骨文方面有贡献，新城新藏也有其可取之处，但这方面的错误论断，不能因其为权威而迷信。故详驳旧说，以正其非。这是我写这篇《表解》的第三个意义。

主旨如是，细节见《叁表解》。

表 貳

表一



表二

